

李

国苑诗英

爱情诗之圣品

政治诗之绝唱

寄深辞婉无其匹



春蚕到死
丝方尽
蜡炬成灰
泪始干

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致空百代

有题

情处

商

隐

卷

111
L421
249

7

中国诗苑英华

李商隐卷

陆永品 选注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P

1997年11月26日

中国诗苑英华

李商隐卷

陆永品 选注

责任编辑 王延梯

特约编辑 刘晓东

封面设计 牛 钧

内版设计 赵 岩

责任校对 张华芳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

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

邮政编码 250100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7.25 印张 182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

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3000 册

ISBN 7-5607-1746-2/I·129

定价:(全十册)118.00 元

序

王运熙

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，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诗歌、散文、戏曲、小说、讲唱文学等等，各体皆备。其中尤以诗歌成果更见辉煌，源远流长，大家迭出，真不愧有诗国之称。

中国诗歌具有光辉的历史。在先秦时代，先是以四言句为主的诗体流行，后经人们选录三百余篇，编集成《诗经》。稍后则是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体（亦称骚体）产生，被后人编集成《楚辞》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，以其丰富的营养，哺育着后世千千万万的文人。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，五言诗逐步发展昌盛，七言诗也逐步成长，五、七言古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样式。在此时期内，作诗成为一种风气，名家辈出，灿烂多姿。之后是隋唐五代。国势强大的唐帝国，经济、文化发达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，诗苑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。诗体方面，除五、七言古体诗外，还形成五、七言近体诗。从此，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这

六种诗歌基本样式，长期为人们所遵用，直到现代。宋承唐代，文化、文学继续发达。在唐诗的高峰后面，宋诗往往写得机智而富有理趣，别开生面，与唐诗争胜。同时，在唐五代形成的词（定型的长短句），至宋代繁荣昌盛，形成了诗、词两体双峰对峙、各擅胜场的局面。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之后，人们一提到中国古代诗歌，总是首先想到唐诗、宋词，它们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辉煌成就。以后在元、明、清时代，五、七言诗和词继续发展，也产生了许多名家、佳作，但总的说来，诗人们以学习、宗法唐、宋为主，创造性比唐、宋较为逊色。此时期还出现了新型长短句散曲，也有名家佳作，惜表现的广度、深度比不上词。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，转移到了戏曲、小说方面。

这套《中国诗苑英华》丛书，选择历代成就最为卓越的少数诗家、词家，编选其部分名篇佳作，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。于先秦取屈原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取陶渊明，于唐取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，于宋取苏轼、陆游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。这十位大家，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，的确不愧为诗苑中光彩最为夺目的英华。他（她）们的诗歌内容广阔深厚：热爱国家民族，甚至愿意为之赴汤蹈火；关怀人民痛苦，希望社会安定；憎恨黑暗腐朽势力，予以揭露和鞭鞑；描绘山川草木，展示祖国和乡土的辽阔美丽；歌咏爱情和亲朋情谊，流露真挚深厚的胸怀，等等。这些，对于我们培养热爱祖国人民、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，认识古代社会的诸般情状，认识大

诗人的高尚品格，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，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从表现形式看，十位大诗人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巨匠。他们构思深邃，才华横溢，语言精炼生动，技巧变化多端，风格或奔放流畅，或深沉顿挫，或平淡隽永，或缠绵曲折，多姿多彩，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，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，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启发和借鉴。

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，是为了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，为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提供营养和借鉴。希望这套丛书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1996年12月

前 言

李商隐字义山，号玉谿生，又号樊南生。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（812），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858）。祖籍怀州河内（今河南省沁阳县）。从祖父李浦起，迁居荥阳（今河南省郑州市）。父亲李嗣曾做获嘉（今河南省新乡市）县令。三岁时，父亲调至绍兴、镇江一带充任幕僚，他随父亲在江浙度过童年生活。十岁时，父亲卒，他奉丧侍母回荥阳。父丧除后，迁家洛阳。从祖父以来，“百岁无业”，家境十分困苦。他在《祭裴氏姊文》中写道：“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……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。及衣裳外除，旨甘是急。”贫困的生活，就迫使他勤奋学习，盼望科举登第，重振家道。当时，他有个隐居不仕的堂叔，擅长古文和书法，在他的指导和熏陶下，李商隐幼年早熟。他说：“十六能著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，以古文出诸公间。”（《樊南甲集序》）十八岁时，令狐楚任天平节度使（故治在今河南省郑州市），辟他为巡官。令狐楚爱其才，对他尤为奖掖，让他与其子令狐绹同学，亲自教授，教他作今体骈文。在令狐楚的指导及其影响下，他学会了今体章奏。他“博学强记，下笔不能自休”（《旧唐书·李商隐传》），即铺垫了他人生的道路及其后来诗歌创作的成就。因此，他终生不忘令狐楚对他的恩德。令狐楚卒后，李商隐沉痛地

悼念说：“百生终莫报，九死谅难追。”（《撰彭阳公表文毕有感》）表示永远难报令狐楚对他的知遇之恩，并极其敬佩他的道德学问。

二十二岁，李商隐初至京城应进士考试，落选后，他非常苦闷，其表叔崔戎任华州（今陕西省华县）刺史，辟他为幕僚。翌年，崔戎调任兖州（今山东省兖州市西）观察使，他随之赴兖，掌章奏。不久，崔戎卒。他失去依托，曾到河南省济原县玉阳山和王屋山隐居学道，修身养性，读书习业，准备应试。二十四岁，他又去京城应举，未被录取，即奉母家居济原。

唐文宗开成二年（837）春，他第三次应举，经令狐绹大力推荐，而登进士第。夏初，东归济原省母。冬，赴兴元（今陕西省汉中市）令狐楚节度使幕，令狐楚嘱其代草遗表。十一月，令狐楚卒，奉其丧回京城。二十七岁，应考博学宏词科，先为考官录取，复审时被所谓“中书长者”抹去。落选后，赴泾源节度使（故治在今甘肃省泾县北）王茂元幕。王茂元爱其才，将女儿嫁其为妻。因其曾依附的令狐楚属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首的牛党，王茂元被视为李德裕、郑覃为首的李党，因此他便被牛党忌恨，令狐绹骂其“背恩”。其实，他并无党派观念，亦无以婚姻谋取富贵意图。而他的一生却遭受晚唐党争的祸害，成为牛李党争的牺牲品。

开成四年（839），应吏部“释褐”考试入选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由于受牛党排斥，不久即调任弘农（今河南省灵宝县）尉。因“活狱”而触怒陕虢观察使孙简，在他将罢职回京时，恰逢姚合代简，谕其还官。开成五年正月，文宗卒，武宗即位，任用李德裕为宰相，王茂元被诏入京。李商隐由济原移家长安，辞弘农尉，求调他职。

唐武宗会昌二年（842），李商隐三十一岁，参加吏部书判甄拔考试而被入选，授秘书省正字。颇想施展怀抱，重振家声。当年冬，其母病故，不得不离职居家服丧。次年，岳父王茂元卒。在此期间，忙于为母亲营葬、为岳父治丧等事。会昌四年，移家永乐县（今山西省芮城县），自称“遁迹邱园，前耕后饷”，“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”。

会昌五年，服丧期满，重官秘书省正字。

会昌六年三月，武宗卒，宣宗即位，重用牛党，大黜李党。李商隐难以保持秘书省之职，于宣宗大中元年，应桂管（故治在今广西省桂林市）观察使郑亚所辟，入幕为掌书记。从此始，他即孑然一身，漂泊天涯，过着抑郁失意、思乡念家的愁苦生活。大中二年初，奉郑亚之命，代理昭平（今广西省乐平县）郡守。二月，郑亚被贬循州（今广西省龙川县）刺史，李商隐失去依靠，离桂管北归。取道潭州（今湖南省长沙市），在湖南观察使李回幕府短期逗留。秋至洛阳。冬初返回长安。在京参加冬选，为盩厔（今陕西省周至县）尉。旋即改为京兆参军，掌章奏。

大中三年十月，武宁（故治在今江苏省徐州市）节度使卢弘止，辟李商隐为判官，得侍御史。卢弘止待他颇好，他精神为之振奋，很想干一番事业，写下不少积极进取的诗篇。大中五年，卢弘止卒；夏秋间，其妻王氏病故，打击沉重。回到长安，穷蹙无路。柳仲郢调任东川（故治在梓州，今四川省三台县）节度使，辟他为书记。在梓幕五年，由于经过仕途坎坷和丧妻之痛，思想趋于消极，转向佛教。他在《樊南乙集序》中说：“三年以来，丧失家道，平居忽忽不乐，始克意事佛，方愿打钟扫地，为清凉山行者。”实际上，他并没脱离现实，还是写了不少咏史诗，供朝廷鉴戒。

大中十年初，柳仲郢调回长安，李商隐随之至京。经柳推荐，任盐铁推官，并游江东南京、扬州等地。大中十二年，罢盐铁官，回郑州闲居，不久即在孤寂、忧郁、悲痛之中与世长辞，年仅四十七岁。

二

李商隐现存诗歌六百首，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，一是政治诗，二是抒怀诗，三是爱情诗。政治诗占六分之一，这在唐代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。他一生经历唐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六

朝，是李唐王朝由强盛繁荣走向衰颓没落的晚期。他的主要活动，是在文宗、武宗和宣宗三朝。在此历史时期，藩镇割据、宦官擅权、朋党倾轧、朝廷腐败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复杂。李商隐极为关注国家命运，在他的政治诗中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存在的问题。

藩镇割据，这是自中唐以来就成为分裂国家的严重问题。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记载：“方镇相望于内地，大者连州十余，小者犹兼三四。”李商隐反对藩镇割据的分裂活动，支持朝廷平藩战争，并对平藩有功之臣给予歌颂。诸如《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》：“将军大旆扫狂童，诏选名贤赞武功……鱼游沸鼎知无日，鸟覆危巢岂待风？”大力颂扬李丕、石雄受命征讨藩叛，指出叛逆刘稹如同“鱼游沸鼎”、“鸟覆危巢”，必将灭亡。《复京》、《浑河中》、《淮阳路》、《寿安公主出降》、《井络》等，都反映了这方面的主题。

由于宦官专权，“迫胁天子，下视宰相，陵暴朝士如草芥”（《通鉴·唐纪》），上至皇帝，下至朝士和平民百姓，无不对宦官擅权深恶痛绝。所以，唐文宗大和九年（835），便发生了以李训、郑注为首铲除仇士良宦官集团的未遂政变，史称“甘露之变”。“甘露之变”的失败，仇士良宦官集团气焰更加嚣张，皇帝受到管制，大批无辜朝臣被迫害，长安平民百姓亦在骚乱中遭到抢劫和杀害。李商隐《有感二首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曲江》等诗篇，即反映了此次严重的历史事件。尤其对刘蕡的不幸遭遇，李商隐更加悲愤。刘蕡是个罕有的文武兼备的人才，因在应试对策中，切论宦官太横，将危宗社，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。后来入仕，宦人深嫉之，诬其有罪，贬柳州司户参军。最后死于放还途中。刘蕡是李商隐的朋友，对于刘蕡的遭遇，李商隐先后写了《赠刘司户》、《哭刘司户二首》、《哭刘蕡》、《哭刘司户蕡》五首诗，为刘蕡鸣冤叫屈，揭露宦人的歹毒，指责朝廷无视人间疾苦。李商隐不畏强暴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敢于为亡友申张正义，足

以说明他不是那种炎凉反脸之徒。可见《新唐书·李商隐传》说他“俱无持操，恃才诡激，为当途者所薄，名宦不进，坎壈终身”云云，完全是出自宦党小人的诽谤之词。

晚唐皇帝，大都昏庸无能，荒淫奢侈，迷信神仙，不理国政。李商隐采用咏史诗的形式，揭露了封建朝廷的腐朽生活。他一方面从正面劝诫朝廷，要认识到历代国家，皆“成由勤俭破由奢”（《咏史》）的道理，也要“莫恃金池忽太平”，应看到“草间霜露古今情”（《览古》）。意谓金城汤池不足恃，古今王朝的兴废，如草间霜露，日出即晞，应当任用贤能，居安思危。同时，作者又用历史史实，曲折地揭露封建朝廷挥金如土，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荒淫生活。如《富平少侯》、《北齐二首》、《齐宫词》、《隋宫》、《南朝》（玄武湖中玉漏催）、《吴宫》等，都反映了这方面的社会问题。对晚唐皇帝迷信神仙、服食丹药，妄图长生的丑恶行径，也给予暴露。如《瑶池》、《汉宫》、《过景陵》等，即反映这类主题。这些诗篇都具有鲜明的“人民性”，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闻乐见。

但也应看到，晚唐时期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，从川陕边境到长江中下游，不断出现农民起义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。《新唐书》（卷二二五）说：“唐亡，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……贤臣斥死，庸儒在位。厚赋深刑，天下愁苦。”对此重大社会问题，李商隐在诗歌中却没有作正面反映，由此亦可见他思想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。

表现怀才不遇、抒发志不得伸的苦闷，亦是李商隐诗歌的突出内容。作者是个早有鸿鹄之志的人，他并非满足作一介儒生，写诗作文而已。他颇有“欲回天地”（《安定城楼》），力挽狂澜，振兴国家的宏志。当他看到晚唐衰颓没落的局面时，曾跃跃欲试，急于建立功业。他在《题汉祖庙》中说：“乘运应须宅八荒，男儿安在恋池隍？”在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同舍》中说：“且吟王粲从军乐，不赋渊明归去来。”正是他不恋故乡、立志天下思想的写照。然而，在庸儒在

位，朋党倾轧的晚唐黑暗社会，并不能任用贤能，而是嫉贤害能，小人庸才得势。像李商隐这样没有党派观念的正直儒生，即使兼有文韬武略，也是得不到重用的。他两进两出秘书省，即是遭受党人嫉妒和排斥的结果。像他这样有才能的人，竟然在朝内谋不到适宜施展才能的职务，却到处漂泊，充任幕僚，当时社会之黑暗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出于无奈，李商隐只有在诗歌中抒发其备受排斥、志不得伸的牢愁。他在歌颂古代英雄和咏物抒怀之作中，便充分抒发了抑郁悲愤、壮志难酬的痛苦。如《武侯庙古柏》、《茂陵》、《贾生》、《钧天》等诗篇，皆反映了他的此种心曲。

作者在一些咏物诗中，往往都能巧比曲喻，表现自己流落不遇、壮志难酬，无所栖托的感慨。如《高松》诗，诗人以高松自比，意谓自己虽有文韬武略，却无用武之地。《流莺》诗，作者以流莺自况，表现其流落不遇，在“凤城”（京城）无所栖身的痛苦。作者深感“欲回天地”，作为一介儒生，是无所作为的。不如学习兵法，成为帝王之师。在《骄儿诗》中，他即如此教诲儿子。直到他临终前，还愤然说道：“如何匡国分，不与夙愿期？”（《幽居冬暮》），为其空怀匡国素愿，却无匡国之职深感遗憾。总之，从李商隐歌颂古代英雄和咏物抒怀的诗作中，我们便可以看到，处于晚唐时期受压抑知识分子共同的忧郁心理及其悲剧性的命运。

李商隐所写的许多爱情诗，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的爱情诗，包括三部分，即：一是写给其妻王氏和别的女子的诗，二是悼亡诗，三是“借美人以喻君子”的抒怀之作。李商隐与王氏感情甚深，情投意合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。作者婚后写给王氏的情诗，由于未予标明，很难识别。如《夜雨寄北》（一作《夜雨寄内》），即是诗人滞留巴山蜀水之间，想到归期渺茫，不知何时方能归家，与妻子闲话此时心境，便写了这首缠绵往复、一往情深的杰作。《赠荷花》诗：“世间花叶不相伦，花入金盆叶作尘。唯有绿荷红菡萏，卷舒开合任天真。此花此叶常相映，翠减红衰愁杀人。”这首六句七律艳情诗，

是诗人以荷花作比,写他与王氏婚后“卷舒开合”、天真自然,感情融洽,并祝愿爱妻青春永驻,相伴终生。李商隐应当还有写给王氏的爱情诗,这还有待大家去分辨。李商隐写给其他女子的爱情之作则更多一些,如《燕台诗四首》、《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》、《嫦娥》,是作者写给所爱慕女子和女道士宋华阳的恋情诗。《板桥晓别》,是作者于徐幕返京途中与爱妓板桥惜别之作。写给其他女子的恋情诗,还有不少是无题诗,如《无题》(相见时难别亦难)、《无题四首》(前三首)、《无题二首》(其一“身无彩凤双飞翼”)等。《代赠二首》是作者代别人所写的爱情诗。李商隐妻子王氏病故后,他写了许多悼亡诗,沉痛地哀悼和缅怀爱妻。诸如《房中曲》、《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……》、《夜冷》、《西亭》、《正月崇让宅》、《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》等,都写得极为悲痛、凄凉。中晚唐时代社会风尚与以前不同,从李商隐的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到中晚唐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。

在李商隐的艳情诗中,有的并非是爱情诗。作者自己曾说:“为芳草以怨王孙,借美人以喻君子。”(《谢河东公和诗启》)他的某些《无题》诗,即是“借美人以喻君子”的别有寄托之作。清代学者冯浩说:“自来解《无题》诸诗者,或谓其皆属寓言,或谓其尽赋本事,各有偏见,互持莫决。余细读全集,乃知实有寄托者多,直作艳情者少,夹杂不分,令人乱耳。”(《玉谿生诗集笺注》)这就说明,判断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,何为艳情诗,何为寄托诗,实在太难。不过,经过仔细研讨,还是能够鉴别一二的。例如《无题》(白道萦回入暮霞),可能是作者暮游有感,借女子口吻,以寓身世之慨之作。《无题》(照梁初有情),是借少女在爱情上的失意,寄寓作者在仕途上的失意和苦闷。《无题四首》其四,是以“东家老女嫁不售”自况,表现作者怀才不遇及其仕途失意的感慨。作者的类似艳情而并非爱情之作,应当如是观。

三

李商隐的诗歌别有滋味、别有趣趣和神韵，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艺术风格。一方面，由于他善于学习、继承古代文学遗产，上自神话传说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乐府民歌、齐梁体诗歌，下及杜甫、李贺等唐代诗人，他都从中汲取营养，为我所用；另一方面，更由于他能刻苦体验生活、艰辛地伏案写作，因而才能突破盛唐和中唐所形成的难以超越的诗歌艺术，开拓而创造具有精丽深婉、富有比兴象征和忧郁感伤情趣的新风格。他在《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，异日偶有此寄》诗中说：“晓用云添句，寒将雪名篇；良辰多自感，作者岂皆然！熟寝初同鹤，含嘶欲并蝉，题时长不展，得处定应偏。南浦无穷树，西楼不住烟。改成人寂寂，寄与路绵绵。星势寒垂地，河声晓上天。夫君自有恨，聊借此中传。”其惨淡经营的创作过程，及其诗歌的忧郁感伤情调，这里已作说明。具体地说，他的诗歌有如下几方面的艺术特色。

比兴象征手法，是我国古代诗歌惯用的创作手法，能够起到生动而含蓄地表达主题的效果。《诗经》即首创比兴象征手法，《关雎》篇开头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两句，即采用比兴象征手法，描写雎鸠鸟雌雄相依在河滩、相应鸣啼的鲜明形象，为下面“君子”思慕“淑女”作了巧妙的暗寓。所以，“关雎”一词就成为纯洁、美好爱情的象征。后代诗人即从《诗经》中继承了比兴象征手法，为诗歌创作增添许多光辉。李商隐使用此种艺术手法，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熟练程度，为其诗歌增加了无限的诗情画意。如《燕台诗四首》其四，开头“天东日出天西下，雌凤孤飞女龙寡”两句，即巧妙地使用了此种手法，比喻象征女主人公失去了爱慕的伴侣。《乱石》开头“虎踞龙蹲纵复横，星光渐减雨痕生”两句，极其生动形象地比喻象征坏人当道，为时已久。《夕阳楼》（花明柳暗绕天愁），把感伤友人远贬、

感叹自己孑孤不知所向，通过登楼遥望孤鸿远逝而自然结合，于即景抒情之中，寓含比兴与象征，则更能起到感人的积极艺术效果。所以，冯浩说此作：“自慨慨萧，皆在言中，凄惋入神。”（《玉谿生诗集笺注》）给予很高的评价。作者使用此法，巧妙灵活，富有变化，比其他诗人，更高一筹。

含蓄朦胧的意境，这是李商隐诗歌较高的艺术审美特征。诗贵含蓄，诗贵朦胧。自古以来，诗人多知此理，亦多如是说。而能真正付诸实践而取得卓有成就者，实在是寥若晨星。在李商隐之前，中唐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《白氏长庆集》凡两千一百九十一首诗，其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占大量篇幅，大都写得内容充实，明快流畅，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特色。唯独他的《花非花》这首诗：“花非花，雾非雾，夜半来，天明去。来如春梦几多时，去似朝云无觅处。”显然与其众多诗篇迥异，则写得极为含蓄朦胧，别具一格。此诗在作者诗歌中，属于感伤歌行一类，有人认为它是悼亡诗，颇有道理。从它所使用的一连串比喻所赋予描写对象若隐若现、似是而非、闪烁不定的形象来看，它好像是作者曾经倾心爱慕而如今却失去了的精灵——美的化身。因此，它表现出一种思慕、感伤、寻觅的深沉基调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尤其李商隐独创的《无题》诗，或类似《无题》诗的诗篇，大都具有像《花非花》这样含蓄朦胧的意境，寄托遥深、情致缠绵、精丽细密，如行云流水，令人回肠荡气，不能自己，在艺术技巧上更加臻于完美。诸如《无题》（相见时难别亦难）、《锦瑟》、《嫦娥》等等，都写得颇为含蓄朦胧，其主旨所在，实在令人难以捉摸。因此，历来歧解纷纭，莫衷一说。尽管如此，仍然博得诗家的高度评价。清代叶燮说：“李商隐七绝，寄托深而措辞婉，可空百代，无其匹也。”（《原诗》卷四）我看用来评价李商隐此类诗及其其他许多诗篇，也是比较恰当的。

讽刺冷隽辛辣，也是李商隐诗歌的突出特色。作者大多采用历史题材，借古代君主荒淫好色、迷信神仙、贻误国事，以致亡国的史

实,对晚唐皇帝重演历史丑剧,给予尖锐的讽刺。如《南朝》(玄武湖中玉漏催):“谁言琼树朝朝见,不及金莲步步来……满宫学士皆颜色,江令当年只费才。”《陈后宫》:“从臣皆半醉,天子正无愁。”都是借南朝陈后主陈宝叔荒淫亡国的历史,对奢侈荒淫、贪恋女色、不理国政的晚唐皇帝,给予辛辣的嘲讽。《梦泽》、《过楚宫》,也表现同类主题。《马嵬二首》(其一),是写安史之乱,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奔蜀,行至马嵬坡,六军同驻,逼杀杨贵妃的史实,讽刺唐玄宗荒淫误国、执迷不悟。意在以昔鉴今,引起当朝皇帝的警戒。其讽刺辛辣冷隽,远胜唐代同类题材的名篇佳作。另外,作者还有讽刺别类的对象的诗作,如《安定城楼》“不知腐鼠成滋味,猜意鹖雏竟未休”两句,是对那些嗜好权位利禄成癖的权贵,却对伤时忧国、志趣高尚的贤士猜疑不休,给予很有风趣的讽刺,真是令人解颐。

作者还有许多名篇佳句,含有深邃的哲理意蕴,富有深刻的思想性,能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。如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(《乐游原》)“雏凤清于老风声”(《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……》)。“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。”(《晚晴》)“越鸟巢干后,归飞体更轻”(同上)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(《无题二首》)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。”(《咏史》)“野鹤随君子,寒松揖丈夫。”(《西溪》)“桃李盛时虽寂寞,雪霜多后始青葱。”(《题小松》)“莺啼如有泪,为湿最高花。”(《天涯》)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(《无题》)等,都蕴含着深邃的思辨哲理,赋予诗作丰富的思想内涵。

众所周知,李商隐的诗歌用典甚多,其用典极为工切精审,凡经史子集,神话传说等,在其诗中一经使用,便注入新的血液,赋予新的内涵,大大丰富了诗作的思想内容,增加了诗作的艺术感染力。但亦由于其用典过多,便使得诗作显得晦涩而费解。

四

本书选诗一百四十六首，所选作品大都为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优秀的篇章，也入选了个别思想性不强而有较高艺术性的诗篇。

明清以来，评注李商隐诗歌的著作颇多，比较有影响的有清代朱鹤龄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、陆崑曾《李义山诗解》、屈复《玉谿生诗意》、程梦星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、姚培谦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、冯浩《玉谿生诗集笺注》。近人张采田《玉谿生年谱会笺》及《李义山诗辨正》。今人叶葱奇《李商隐诗集疏注》，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。较好的选本有王汝弼、聂石樵《玉谿生诗醇》，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诗选》等。此选以冯浩本为底本，个别文字，参照其它版本订正。

诗无达诂，自古而然。尤其李商隐的诗歌，用典甚多，比较费解，这也是各家注释评说歧义纷呈的原因。元好问说：“望帝春心托杜鹃，佳人锦瑟怨华年。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”（《论诗三十首》之十二）意思也是说义山诗用典过多，不易理解，尚且还没有人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诠释。本书的有些注释，或征引前人的不少见解，也只能是一家之言。在注释和题解中，参考了前贤著作的一些见解，在此谨致谢忱，就不一一注明了。由于时间和个人水平的限制，书中肯定存在缺点和错误，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陆永品

1996年9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